



马勇近照



《甲午战争十二讲》
马勇 著
华文出版社
2014年8月出版

爆发于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深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今年,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,都存在一股反思甲午战争的热潮。今年上海书展期间,著名历史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推出新作《甲午战争十二讲》,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种种争议,给与了独具视角的解读。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,马勇也在读书会现场进行了回答。

破解甲午战争之谜

——历史学家马勇新作《甲午战争十二讲》出版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甲午之战中国为什么输了？

现在很多人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归为国力、军力不强。马勇澄清说,历史的实情是,清政府当时的国力虽弱,但经济实力在亚洲仍然很强,海军力量在亚洲则排第一。“中日的海军将领基本上都是毕业于英国,学习同样的战术,开着相同的战舰,连海军的旗语都一模一样。甲午战争的失败,和经济以及军事关系不大。”

在马勇看来,清政府战败主

要是体制问题。彼时,日本已经完成了明治维新,内阁经常吵吵闹闹,什么事都要商议,看起来很难达成一致,但真到了决定出兵朝鲜以后,短时间内就在政府层面达成一致,然后开动宣传机器,举国动员。而晚清政府看似一统天下,政府实力雄厚,但真正到了战争之时,并没有举国动员,老百姓也不关心战争,政府层面则基本只有李鸿章在独力撑持。

“甲午战争到最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谈判,其间非常艰苦,但日本还是希望尽快达成协议,争取割地赔款,占有通商口岸,打开中国市场,为什么呢?日本害怕晚清政府真的举国动员,那后果根本不可想象。”马勇解释,甲午战争虽然发生在中日之间,但并不是一国与一国之间的整体较量,连晚清政府内部都没有形成统一对日的意识,“说到根本,是制度的较量”。

李鸿章是不是“汉奸”？

在读书会现场,学者陈子善就甲午战争中的焦点人物李鸿章提了一个问题:在近代历史上,李鸿章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,很多评价认为李鸿章是“汉奸”,那么现代人该如何看待李鸿章这个人呢?

马勇解释,李鸿章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全面介入政治,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他几乎都有参与,“但要记住李鸿章是个参与者。李鸿章身背的骂名,并不能抵消李鸿章在晚清政府体制中的地位”。马勇举例说,在李鸿章去世后,梁启超曾专

门为李鸿章立传,在他的《李鸿章传》一书中,有这样一段评价李鸿章的话:吾敬李鸿章之才,惜李鸿章之识,而悲李鸿章之遇也。

“为什么其时激进如梁启超这样的人,都会为李鸿章说好话?在我看来,晚清政府中具有国际视野、洞晓历史走势的官员中,李鸿章堪称翘楚。”马勇说,李鸿章一直采取“以夷制夷”的策略,客观上促进了晚清科技、经济的发展;另一方面,李鸿章也认识到晚清之弊应该改革,列强也是推动改革的一股被动的助力。“比如当时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的许多人在

替清政府做事,或者进入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的幕府,他们将伴随工业革命的贸易观念带给了这些晚清大员。”

甲午之战,李鸿章并不想打,他更希望通过外交调解的渠道避免战争,但是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主战的声音存在。“李鸿章虽然主张外交斡旋避免战争,但是如果战争无法避免,他也认为要打就好好打。”马勇说,马关谈判之前的战争,也只是李鸿章的嫡系淮军与日本之间的战争,并不是晚清政府和军队对日的全面战争,“在近代中国历史上,李鸿章是很悲剧的人物”。

慈禧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作为当时清政府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,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,她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也一直被后世批评。

马勇则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形象更为全面的慈禧太后。马勇说,1860年代是中国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变化最快的年代。慈禧太后是个女人,1861年开始守寡,1888年光绪皇帝亲政,慈禧要求退居幕后,但是在这一年,慈禧没有退掉。因为光绪不让退,群臣不让退,光绪的老师也不让她退,她并不是全凭自己意愿留在这个统治者位置上不愿放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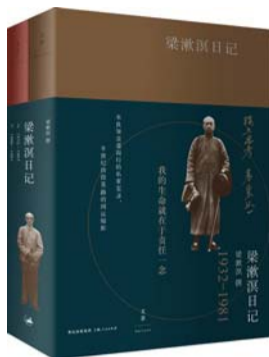
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,慈禧太后60岁,为慈禧祝寿成为举国大事,何况在这一年,慈禧太后

郑重准备交权。从这一角度来说,1894年是中国的“政治大年”。马勇说,在封建社会里,这样的“政治大年”,慈禧的寿辰是最大的事情,其他的都要让路,“晚清政府将注意力放在为慈禧太后庆祝寿辰上,你会理解这是这种政体下历史的必然”。

“批评者说慈禧太后挪用军费来做寿辰,标志是用军费去建造颐和园。这种批评不能说没道理。但批评者往往不说另一个原因,颐和园既是光绪帝为慈禧选定的颐养天年的地方,又是满人海军学堂的举办地。”马勇解释,汉人大臣里的李鸿章带出了北洋水师,满人权贵们也想培养自己的军事家、海军官员。建在颐和园的海军学堂,也使用了国库

的钱。

李鸿章、慈禧太后的形象,在我们后来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好形象。他们真的这么坏?马勇说,历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探寻,既要在诸多关系、诸多细节中寻找,还看重“叙述者”是谁。不同的叙述者会说出不同的内容。比如慈禧太后、李鸿章的形象,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被扭曲了,晚清灭亡辛亥革命成功,两者的时间差太近,但追求的体制截然相反,晚清的代表人物怎么会被客观描述呢?批评他们是革命正当性的需要。“辛亥革命之后是民国,这百年来革命浪潮接连不断,革命需要的正当性也持续了下来。所以,对他们真实的历史形象,一直还属于雾里看花。”



《梁漱溟日记》
梁漱溟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14年8月出版

探寻梁漱溟的心路历程

《梁漱溟日记》全本首次单行出版

本报讯(记者 吉祥)1953年的最后一天,梁漱溟以这样的文字为当天的日记收尾:“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好事?”当天,他与领袖发生了此后常被提及的“雅量之争”。

梁漱溟从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,但因战乱等原因散失了不少。比如,梁漱溟20岁前后倾心出世闭门研读佛典时期,写就了《楞严精舍日记》,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,遗憾的是被人当废品卖掉了。“文革”抄家更是致使他有6年的日记全部丢失,4年日记严重残损。不过即便如此,劫后余生的日记仍有近80万字,始于1932年,终于1981年,前后跨越50年。近日,这些日记经重新校勘,首次以全本单行的形式由世纪文景出版。

日记的出版提供了一个研究梁漱溟的更好窗口。今年上海书展期间,世纪文景组织了一场《梁漱溟日记》读书会。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解释了父亲从佛学转向儒学的原因。“他说佛学的宇宙观、人生观,是一个终极的真理,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,不可能接受他。他把救世的想法转向儒,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,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,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、乐观,同时也很稳妥的了,它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。”梁培恕说,父亲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的。

梁漱溟此后的人生经历的确也体现了儒家救世济民的情怀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他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,试图“将农村改造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”,尽管在邹平的实验因抗战爆发而无奈中断,但他依然坚持救国之志,巡视抗战后方,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斡旋,调停国共两党争端。

当人们赞许梁漱溟的哲学贡献时,他却反复将自己归入“行动派”。读书会上,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引述梁漱溟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说:“他说不喜欢哲学,我没有想到自己已被看成是学者。”梁漱溟研究专家艾恺教授也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,在一场梁漱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,走入人生暮年的梁漱溟用非常有力的语气大声说:“我是拼命干的!”

梁培恕在读书会上提到了梁漱溟与熊十力、伍庸伯的交往,在评价熊十力时,梁培恕用了“率真”二字。“梁培恕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是率真,那么梁先生(梁漱溟)就是直。”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刘东说,梁漱溟在日记里多次对自己痛下批判,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这在《梁漱溟日记》里得到了佐证,他经常自我反省:“浮夸不实,多所等待……与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”;“自欺自昧,骗人骗己……终日在自己所谓责任(其实是意气担当)及一些世俗趣味上混日子”;“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,没出息到家”……

不少人记住了建国后梁漱溟的廷争面折,对他在“文革”遭受批判时傲然宣称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”由衷钦佩。然而,此类所谓传奇,于梁漱溟自身而言,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。“独立思考,表里如一”这八个字既是梁漱溟的自我评判,也为后人所公认。



梁漱溟部分日记本